

赴台英雄“密使一号”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这是
“密使一号”奔赴刑场时吟诵的一首诗。

“密使一号”叫吴石，是台湾“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1950年6月10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当时对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一桩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1973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解放战争期间，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吴仲禧，通过与吴石的老乡关系，被委任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

1949年5月，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在上任之前，他专程到香港和中共地下党联系工作。吴仲禧代表组织告诉他，已经介绍谢筱迺同志与他联系，有什么重要材料都可交给他。吴石回福州后，与谢筱迺秘密见面。吴石向谢筱迺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1949年7月，吴石经广州辗转转到香港，最后一次和吴仲禧见面，他告诉对方，他即将调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并告诉他，组织上让他在台湾潜伏，联络代号是“密使一号”。为了避免蒋介石怀疑，除了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留在大陆外，夫人王璧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女都随他一同去台。

1949年12月初的一天，吴石穿着整齐的中将军服，在台北寓所的书房里接待一位穿着漂亮旗袍的中年女人。对方从身上取出

一封信交给吴石。吴石看后，说：“哦，朱枫女士！”他再看落款“刘栋平”的署名时，心中顿时明白，她就是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

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湛之。

来台湾前，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内定的“台湾省委书记”，刘栋平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党员，与吴石有联系。

舒同说：“现在中央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抓得很紧，只有通过我们的‘密使一号’吴石，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这就要有人赴台亲取，我们认为只有朱枫同志最合适。”

“关于和‘密使一号’联系的问题，吴石赴台前，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给他。”刘栋平递给朱枫一张小纸条。

“你到台湾后，还要和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舒同说，“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代号‘老郑’。你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听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慎重藏好情报，三天后，在基隆港码头，她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手中。这

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手中。

朱枫随后又约见“老郑”蔡孝干。

在此后的40多天中，她分别和吴石、蔡孝干多次见面，又获得几批情报，都交张大副安全带走。

恰在这时，情况突变！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也被捕叛变。

吴石派交际科科长聂羲紧急约见朱枫，说：“‘老郑’被捕叛变，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病为名，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敌人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立即扑向吴石寓所，很快从吴宅中搜出他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蒋介石当即下令：立即逮捕吴石、朱枫！

吴石、朱枫、王璧奎相继被捕，被牵连的还有吴石的老战友、“联勤总部”中将总监陈宝仓等国民党高级军官。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羲、朱枫被台湾当局“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当年毛泽东称赞“密使一号”的诗文。

（摘自《周末》）



1937年陶铸和曾志在汉口，这是陶铸寄给母亲的照片。

陶铸兄弟间的恩恩怨怨

陶铸兄弟早年丧父，家境贫困。陶铸为支持哥哥读书，12岁就在乡间背柴卖苦力，哥哥吃白米饭，他喝萝卜缨子汤。在上世纪20年代，陶铸投考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陶自强则在湖南参加共产党，参加了秋收起义。以后，他们又都做白区的地下工作，又在同一时期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

陶铸准备将牢底坐穿，而陶自强怕受刑更怕死，当了叛徒。

从此兄弟俩走上两条不同的路。

陶自强一步步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县长；在解放前夕，率县大队起义，后来在祁阳中学当了校长。

1951年底，陶铸胜利地完成了在广西剿匪的任务，返回武汉时，顺路回了趟祁阳老家。到了老家后，陶铸竟是首先看望那当过叛徒并且被他骂了一路的哥哥。陶铸和他哥哥相会的那一刻，彼此叫着亲切的幼时名字：“际华！”“耐存！”四只手在刹那间便紧紧握在一起。毕竟陶自强还没坑害别的同志，陶铸还把他当作手足。“你不适合当校长。”陶铸第一句话就这样说，“别再误人子弟了。就当个语文教师吧，你适合教书。”

1967年8月，也就是陶铸成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倒的第八个月，他的胞兄陶自强又在背后给了他一刀，揭发他是叛徒。

这一次给陶铸的打击太大了，他一连几天两眼发直，不吃不动，就那么呆呆地坐着，眼里一会儿燃起火焰，一会儿又盈满泪水。

两年后，陶铸带着“叛徒”之名死去了。

在祁阳县为陶铸举行追悼会上，陶自强苦苦哀求允许他参加，而被人们拒绝。自此，陶自强精神崩溃了，很快又患了癌症。

他临死前曾给曾志和陶斯亮去信，泪水溅湿了信纸，第一句话就是：“我给你们跪下了。”他说：“给我一句话：宽恕我这个罪孽深重的可怜人吧！”看着陶自强写来的信，曾志情绪波动。她后来望着陶铸的遗像，望了很久，终于什么话没说就走开了。陶斯亮悄悄给伯父回了一封信，说：“伯父，我不再记恨你。”

陶自强生病在床，久不能下地行走，收到斯亮的回信，竟奇迹般走下地，爬上龙山，抱住为陶铸树的碑说：“铸弟，我来了……给你请罪来了……”刹那间，陶自强顺着石碑滑倒，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摘自《老年生活报》）

中国近代史 首任驻美大使陈兰彬

中国首任驻美大使陈兰彬1816年出生于广东吴川县黄坡村，五岁能作诗。后来，他考中进士，屡任要职。

陈兰彬与著名的爱国志士容闳搭过档。当年，容闳向清廷提出了“挑选聪颖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务、步算、制造诸学”的建议，为当局所接受。曾国藩、李鸿章为此向皇帝推荐了陈兰彬和容闳作为执行者。

1872年8月11日，陈兰彬带领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远赴美国。此后，每年派30人，到1875年，已派出官费生120人（已有自费生10人），完成了这件具有长远意义的大事。

陈兰彬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做过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的第一位大使，以及当过首任赴古巴调查华工状况的专使，完成过两件大事：

其一：1878年陈兰彬赴任，目睹美国华人中的十多万备虐待、歧视、欺凌、压迫的惨境，即向清廷报告，建议派设中国领事，让华侨有个依靠。为此，会馆非常感激，张挂了陈兰彬的肖像，称他为“青天”。

其二：陈兰彬到哈瓦那后，立即着手同古巴殖民当局谈判，亲自到收容站、奴隶卖所、监狱，以及种植园、制糖厂等处作细致的调查，收到了由千余名华工签名的85封陈情书，听取了1762名华工的血泪口述，写成了《古巴各城乡查讯各华工口供清册》，向清政府提出了详细的报告，使政府重新制定有利于华侨的政策。

1895年，79岁的陈兰彬去世。
（摘自《羊城晚报》）

日本“无核三原则”幕后交易

日本外务省新近解密的外交文档证实，前首相佐藤荣作于1965年1月访美之际，曾向当时的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请求美在日中两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包括先发制人式攻击在内的对中国的核报复。在得到了美国的保证后，日本提出了“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

1964年10月，正值东京奥运会，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宣布跻身核大国行列。这对世界唯一的核受害国日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刺激。地理上的毗邻，加上冷战的敌对关系，使与台湾有密切的官方来往而跟北京却尚未建交的日本视中国为现实威胁，同时也构成了佐藤访美的背景和动因。

佐藤到达美国后，与麦克纳

马拉的会谈于1965年1月13日举行。

谈话中，针对中国核试验问题，佐藤说，“如果（与中国）发生战争的话……我们期待美国能在第一时间以核武器进行报复。届时，虽然构筑陆上核设施不是简单的事情，但如果海上的话，可即刻启动。”对此，麦克纳马拉回答道：“技术上无任何问题。”

在与麦克纳马拉会谈的前一天，佐藤先行拜会约翰逊总统。会谈中，佐藤说：“无论中国核武装与否，日本不会以核武装，只有依存于与美国的安全保障条约。因此，我们需得到美国会切实保护日本的保证。”约翰逊答道：“我们保证。”不过，佐藤对麦克纳马拉说，“当然，从技术上说，我们是制造核弹的。我们正在生产用

于宇宙开发的推进装置，如有必要的话，也可转为军用。”也就是说，佐藤试图向美方表明：尽管日本拥有核武装的能力，却不打算核武装，而是期待美国的核保护。

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美日虽为同盟，但基于曾一度交手的历史教训，美在骨子里其实仍对日本抱有戒心。而后者向自己要求核保护，何乐而不为呢？既可给日本一颗定心丸，亦可借此让同为核国家的中国意识到美国的核威慑力量。

得到了美国的保证，访美3年后的1967年12月，佐藤荣作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了“无核三原则”方针。佐藤其人甚至也因此获得197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摘自《老年生活报》）

胡适的外交生涯

1942年，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侯恩百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权限所致。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引起蒋的不满。1941年初，蒋介石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

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蒋看来也是用美国政府压国民政府，他是不希望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

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也是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摘自《周末》）